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思访谈录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思访谈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吴思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309-07875-6

I. 我… II. 吴… III. 中国-历史-研究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2156 号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

吴 思 著

责任编辑/李又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00 千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 000

ISBN 978-7-309-07875-6/K · 317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本书收入了 29 篇对我的访谈,从 2003 年至 2010 年。编这本书,完全是编辑的创意。他收集了文章,分类整理,编出了初稿。在此基础上,我补了几篇,删了几篇,然后调整分类,重做标题,再补写这篇序言。

分类肯定出毛病。如果不分类,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便于内容浏览。如果分类,几乎每篇访谈都是综合性的,有眉毛有胡子还有头发,到底应该放在眉毛的位置上,还是胡子的位置上? 没奈何的办法是,胡子多就放在胡子的位置上,眉毛多就放在眉毛的位置上。或许有几根眉毛特别醒目,也连胡子带头发一并放在眉毛的位置上。

访谈录的原标题风格各异,都比较抢眼。强行分类之后,多数标题重做,强调了重点内容,难免损伤文采。还有,一些近似的提问和答复多次出现,我怕读者烦,删了许多,损伤了原作。原作有个别误解误记之处,还有笔误,我也擅自改了。上述种种,请访谈者原谅。尽管有所删节,各篇内容仍有一些重复,也请读者原谅。

2003 年《血酬定律》出版之后,我写过一些文章,整理过几篇讲演稿,想结集出版,又感觉单薄,整体上也不够成熟。现

在,更不成熟的访谈录结集出版,需要说几句弥补缺陷的话。

我努力构建的历史观的核心支柱,是一个从行为生态学借来的概念:生存策略。采集渔猎是生存策略,暴力掠夺也是生存策略,游牧、务农、做工、经商,都是生存策略。所有生存策略,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各种职业,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所得 $\geq$ 所付。在等式之上,得付比越高,发展潜力越大,反之则衰亡。各种生存策略集团互动演化,好像不同物种互动演化一样,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世态平衡——人类社会各种生存策略的得付比平衡。换句话说,人往高处走,直到力尽计穷或得不偿失为止。

这种历史观,接着生物进化的故事,讲述人类生存策略的演化,又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称之为造化史观。本书一再提及的血酬史观,只是造化史观的一个特型,一种描述暴力集团主导的世态变迁的理论。

书里说“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就结构而言,这话不错,就过程而言则未必。盖房之前,工匠早有成竹在胸,我却没有。我的感觉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先有两三砖瓦,再有一二梁柱,构件积累多了,因材施教,设想出房屋的样子,然后一边盖,一边改,一边积累构件,至今还在施工。在我的想象里,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是如此。既然如此,添砖加瓦,共襄大事,不成熟就不成熟吧。

吴思

2011年3月13日

目录

自序 / 1

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

- 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 / 2
- 元规则理论的根基:生命换资源的原始策略 / 29
-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再到元规则 / 39
- 官家主义这个词 / 44
- 官家主义和血酬史观 / 58
- 建构血酬史观 / 62
- 重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 73
- 基本概念出了问题 / 81
- 命名是认识世界的手段 / 86
- 历史与公正计算 / 92

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

- 局观历史 / 110
- 规则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 116
- 拆解人间对局:潜规则的系列概念 / 121
- 历史对局的终极法则 / 141

我的写法就是解局之法 / 148

观念版图的融合

老子曲线 / 164

儒家与自由主义是可能调和的 / 182

《中庸》可以和自由主义接轨 / 190

谎言的成本和收益 / 194

我对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 200

从历史看现实

黑窑事件与地霸秩序 / 222

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 231

掠夺性策略的利益关系 / 242

官职交易的三种机制 / 248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进化 / 250

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

我的心病与我的写作 / 260

研究苹果掉下来的道理 / 273

理论创造源于绝望 / 283

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 291

出版后记 / 304

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

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

访谈者：《名人传记》 郑雄

时间：2009年1月6日

我们的信仰问题，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的病灶引发的

访谈者：吴老师，我先给你念一段话。北大的钱理群老师几年前有篇《矛盾和困惑中的写作》。这篇文章里，钱老师说：“我发现，对大至国家、民族、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具体到自己专业范围的文学的现代性，我都只能说‘不’——我拒绝、否定什么，例如我无法认同我们曾经有过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我也不愿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但我却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我不过是在矛盾与困惑中，勉力写作而已。这并不只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实在是因为90年代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太大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我们对这一切太缺

乏思想准备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为自己 80 年代的单纯付出代价。”

钱老师的这段话您怎么看?

吴思:总体上这种描述我赞成。他说的大概是一代人的感觉:过去非常清晰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文艺观,现在崩溃了。崩溃之后,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思想深处一片混乱。我觉得,从 1978 年前后开始一直到现在,情况可能一直是这样的。不过,我跟钱老师有几点不一样。

第一点是,他说,为自己 80 年代的单纯付出代价,我觉得说短了。源头不是在 80 年代,而是更早——我们一直都在付出代价。我们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先走错了路,走不下去了,改革开放就开始转向。回头一看,原来建立的那套主张、观念、理论体系全部崩溃,我们的世界观随之崩溃。

看起来,似乎是中国人付出了差不多三十年的代价。其实如果再往远处说有更广更深的背景。世界范围内,从 19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全体知识分子开始“向左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一种强大的威胁,直到前苏联解体以后,从 1990 年代开始,重新接着自由主义往前走。人类绕了一个大圈。

普京说,苏联走了一条大弯路。我们呢,也是在为人类的一段历史付出代价,为全人类的天真付出代价。

第二点不同是,钱老师说无法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一直在试图形成自己的判断。

钱老师说,对过去的那些东西,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说“不”。其实,知道在什么地方说“不”,本身也是有建设性的。原来的不

行,就想建立新的,感觉对就走下去,一旦走偏了,感觉不对了,就会探索新的方向。他其实还是肯定了一些东西——否定之中包含了肯定。他在不断地否定,否定完了一圈,中间留下的那个空档可能就是需要肯定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可以说一说中间的那个空档是什么。文学观我说不清楚,但历史观我觉得是可以说点什么的。也就是说,在旧的历史观崩溃的时候,新的历史观的地基打在哪儿,几根柱子,几根房梁,先盖起一两层,最后可能到七八层,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我觉得我能说到十之六七。

访谈者:我知道,您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要搭起这个新的历史观的基本构架。那么,如果我们把钱老师的这个说法作为一种当今社会的精神现象,你觉得这个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知识准备上有问题,还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不够?

吴思:不是知识准备的问题。没有经验,根本就谈不上知识。如果连基本的经验都没有就更谈不上。

人类从原初走到工业文明,发展出资本主义,然后出现经济危机,等等,这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前苏联或者说斯大林的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搞现代化,又是全人类都没有的经验。

斯大林在前面走,毛泽东在后面跟。他觉得自己能走得更好一点。他有的地方的确要好一点,至少在搞人民公社的时候不像前苏联似的那么稀里哗啦。但是后面紧接着他就出了更大的问题——大跃进……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在缺乏前人经验的情况下前进的,所以知识准备这个要求就没法说。你不能说是知识准备不足,因为知识是准备不出来的。没做过的嘛,没有那段历史经验到哪里去学那种知识?只能摸索着走。

所以,我觉得不是知识准备不足的问题。我们还能看到,斯大林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知识不足,他们觉得真理在握,掌握了历史规律,根本不容反对,显现出极端的自负。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面对历史上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无论是谦虚还是自负,都应该允许试错和调整,如果不允许争论,让自负的掌权者一条道走到黑,这才是大问题,而且是中国和俄罗斯历史上的致命之病。于是,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的病灶引发的。

访谈者:从一般意义上,你觉得“信仰”是什么样的概念?

吴思:应该说,人类的生活有多广,信仰就涉及得有多广。比如说我们信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甚至什么样的婚姻关系、两性关系,等等。你相信那是最理想的,那就是信仰。这是广义的信仰。但是我们通常谈信仰,说的都是所谓终极关怀层面的东西,就是最核心的东西: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哪里?怎么安身立命?怎么让人生意义最大化?仅就这一点来说,信仰就是在哪儿找到安身立命的处所,找到人生意义最大化的办法,这样做了才觉得死而无憾。我觉得这种信仰是我们通常谈到的最高层次的信仰。

很多西方人觉得,上帝是无限的,是永恒的。走近上帝,同化于上帝,你就进入了不朽,进入了永恒和无限。

中国儒家也有一套说法。最标准的答案就是张载的《西铭》所表达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就是说,生存的时候按照天地的道理走,与天地万物精神往来,赞天地之化育;死就踏踏实实地死去。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办法,就这

么活，就这么死。他在那套天道人伦、物我关系之中追求我与他人、我与天地万物、我与道融合的最高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就是天地境界。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流行开来之后，上帝和天道就被替换成了共产主义事业或历史规律。人们信奉雷锋那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假如把为人民服务替换成“共产主义事业”，那就变成了保尔的话：“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都是在解答人生的最高价值、最高意义、终极关切的问题。

解释历史得从单细胞生命出发

访谈者：刚才你说到历史领域，你能不能够确信在历史领域你有什么样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是一种实在的价值观或精神境界。另外，在这种观点之上还有没有更加超越性的东西？这种更加超越性的东西可以在更高层面上把历史观啊文学观啊都能够统率起来？

吴思：我觉得能。你是想让我来说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对吗？

访谈者：就是说，有这么一种现成的理论——如果没有，我

们就建设一套理论，所谓哲学的哲学，能够用它来把所有的学科给统领下来。您觉得这个可能吗？

吴思：可能。因为在根子上所有的生物最初都是源于单细胞。单细胞生物存在的问题，生命展开后出现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那个根源。顺着单细胞生命演化的思路，物质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能得到解释。

当然，人这个物种出来以后，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就是人的精神怎么安顿。吃饱了喝足了，他活着是为什么？

也就是说，造化从一个单细胞开始，往前走，最终造出了造化本身不包括的东西，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我”是干吗的？我有什么用？我活着是为什么？本来，活着为什么在基因的层面上是很清楚的，就是永远活着，再创造新的基因，更多的生命。这就完了。但是人还是要发问，人不会满足于这个答案。不过，寻找新的答案，解决精神问题的答案，和解决基因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方向是一致的，最终还可能归结到一个本源之中。

访谈者：那么，分析这个单细胞生命的方法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找到？

吴思：有可能。所有的社会科学，其实都是一个根本问题的展开，根本问题，就包含在单细胞的生命之中。

单细胞的问题是什么呢？单细胞生命，例如草履虫，放到水里，再滴一滴盐水，草履虫就躲避着盐水。它能感觉到高浓度盐水有害，高浓度的溶液会把它的体液吸光。但若滴下去的是糖水，它就会感知到，这是一种能量，就会向那边移过去，获取它需要的东西。别看是单细胞生物，它已经有一种趋利避害

的本能反应。它在事实上进行了比较和计算。如果获取这种利益路程太远,那种能量的浓度很弱,激不起它的行动,它就不去了。只要得不偿失,它就不去——单细胞拥有利害计算的能力。当然它的计算不用数学符号,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如果它没有这种本能,不知利害,不计得失,害不知躲,利不知趋,这样的东西你能想象它不会被淘汰吗?它活不下去。

所以,算得越准确,获取收益的效率越高,那个物种就越繁盛。不管是树木、花草还是海藻,在同一个竞争的环境里,哪个物种最善于利用资源,而且得大于失,利大于弊,那个物种就会越来越成功。这就是单细胞生命的利害计算方式:权衡付出和得到的关系,“得付比”高的昌盛,“得付比”低的衰亡,“得付比”中等的停滞。“得付比”是负数,活不了几天就死。

同样方法可以解释物种的出现、物种的演化、物种的兴衰。例如屎壳郎,它找到了利用能量的独特方式——粪便也是一种能源。自然界竞争太激烈了,它别的不会用,只会用粪便。所以说,一种生态位出现后,只要能找到利用这个生态位的能量的适当方式,相应的物种就会诞生,就会存在下去。

我们人类也是这样的一个物种。人类特殊的技能是会制造工具,能认识、分辨更广阔环境中的利害,用更多的手段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能量和资源。我们可以用符号来表达、交流,能够作出一些推理,深入认识环境,并且使得制造工具、对环境的认识超出个人的经验范围,变成可积累的文化。人类文化核心的一点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能量和资源、趋利避害——比如说,如何获取食物,如何逃避山火、野兽的袭击,甚至反过来可以袭击野兽,等等。只不过,人类已经不再是依

靠本能,而是依靠文化积累来完成这一过程。

好了,我们已经从单细胞生物的计算方法跳跃过来,从生物的进化讲到了人类文化了。人类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生存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不同的得付比。比如说,采集、狩猎两种生产方式,你付出了多少,得到了多少?算一算,如果可采的食物越来越少,可打的猎物也越来越少,也许我们种植和畜牧就更合算。于是,农业,包括种植和畜牧,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出现了。它的“得付比”比较高嘛。

当然,抢劫也是一种生存策略。有人抢你的粮食,抢他的牲畜——暴力集团产生了。如果暴力集团的付出很少,收益很高——用我的话说就是血酬很高,利益很丰厚,而且可以长期维持,那么这个暴力集团就诞生了,不管它是土匪、军阀还是贵族、皇帝。暴力集团是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的载体和化身。

同样,农民就是耕种、收割这种生存策略的化身,猎人就是狩猎策略的化身,牧人就是畜牧策略的化身,每种生存策略都有自己不同的得付比。有人说世界是平的,我说这个世界上的“得付比”是平的。如果一个行当得付比特别高——所付甚少,所得甚丰,比如说当官——人们就会蜂拥而去当官。这时候就必须建立一个壁垒,让人轻易进不去。中国人就发明了科举。想当官,你得考。等你付出十年寒窗苦的代价,当上了官,一算,得付比基本还是平衡的。其实历经十年寒窗,也很少有人能够有当官的运气。如果一个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材料,那二十年可能也考不上,这辈子可能就瞎了。有这个天赋,超越了官场壁垒,进去了,他们是赚了。但是对于读书方面的笨人来说,可能永远爬不进去,即使爬进去可能也是像范进似的,最后

头发白了才考上,那你说他这辈子整体计算是亏了还是赚了?其实还不如去当个杀猪的。日子过得还好点,不那么惨。范进最后是考上了,但他要再晚个五年呢?或者他中了以后没那么顺畅呢?或者是贪得太过分被人当贪官给抓起来呢?就是说他这辈子还是亏的。

整个社会有一个均衡的得付比。我们用这个均衡,按照得付比就可以解释很多问题。比如说,政治学或法学上的成本收益计算就是计算义务和权利。如果你的义务特别多,权利特别少,那你是一个被压迫阶级——你的徭役负担重,可你却并没有获得各种社会福利的权利。如果你是贵族,那就吃铁杆庄稼,干不干每年都有你那一份,权利就多,义务就少。

我所要说的历史观或者社会演进观,基本上就从这里出发。都是一种得付比的计算。对于单细胞生物来说是趋多大的利,避多少害的权衡,是这种趋利避害的器官和本能的进化;对于法律意义来说就是权利、义务的计算;对于市场来说就是成本、收益的计算;对于土匪来说就是生命伤亡和血酬的计算。这样,就能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这些领域都给串起来了。所有领域背后都是一个得付比的计算问题。得付比最终是均衡的,是平的。

访谈者:这个能不能说是现在您正在“建造的那个房子”的基础部分?再往上是一种什么情况?

吴思:这是地下室部分,打地基的,打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才算到了硬底。如果再往上“盖房子”的话,就得从中国历史的第一页说起。

第一页是黄帝。黄帝为什么跟炎帝打仗,为什么征伐各部